



C2012030628

亚洲伦理城市主义

——一个激进的后现代视角

[新] 林少伟 (William S W Lim) 著
王世福 刘玉亭 译
邓昭华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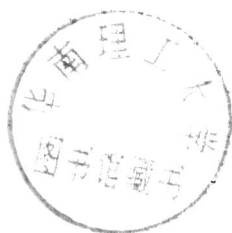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助 批准号: 11&ZD15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批准号: 50978101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亚洲伦理城市主义

——一个激进的后现代视角

[新] 林少伟 (William S W Lim) 著
王世福 刘玉亭 译
邓昭华 校



C2012030628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7-491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洲伦理城市主义——一个激进的后现代视角/(新)林少伟著;王世福,刘玉亭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1
ISBN 978-7-112-13842-5

I. ①亚… II. ①林…②王…③刘… III. ①城市建设-研究-亚洲 IV. ①F299.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53740号

Asian Ethical Urbanism: A Radical Postmodern Perspective

Copyright © 2005 by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book, or parts thereof, may not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now known or to be invent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arranged with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Singapor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孙 炼 姚丹宁

责任设计:赵明霞

责任校对:陈晶晶 王雪竹

亚洲伦理城市主义

——一个激进的后现代视角

[新] 林少伟(William S W Lim) 著

王世福 刘玉亭 译

邓昭华 校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毫米 1/16 印张:14 字数:236千字

2012年4月第一版 2012年4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49.00元

ISBN 978-7-112-13842-5

(21607)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谨以此书献给亚洲发展经济体里数百万的城市贫民，他们有权分享发展的成果。

译者序

关键词：

亚洲伦理城市主义、后现代主义、后规划

随着亚洲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亚洲城市发展的议题也日益备受学者关注，该书正是近年来众多出色的著作中的一部。

这是一部反思当代亚洲城市建设的论著。该书以欧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趋势为基点，以“后现代主义”为理论基础，提出了亚洲城市的城市化进程、方式和路径不应该生硬照搬西方的“经验”的论点。同时，该书认为，亚洲城市的现代化应该立足于国情、地方特色、地方环境、宗教文化、政治现实等因素，充分尊重社会各个阶层，建立多元化的现代亚洲社会。

对国内同行来说，该书有很强的可看性和启发性。它有三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第一，作者的身份特殊。该书作者是一位新加坡的执业建筑师和城市评论家。由于新加坡与西方接触较为紧密，该书作者得以以全球高度的战略眼光，来审视他长期工作的地区的城市化历程。而该书则是他对亚洲城市长期观察的感悟。

第二，书中论点鲜明、独到，值得国内同行深思。作者在该书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现在该做什么？”作者认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利润的追求的结构是难以动摇的，但建立有地方性的伦理管理是可能的。作者的理想是要建立空间公正和有地方特色的亚洲城市环境。他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的回答是要建立“亚洲伦理城市主义”，其标准是要建立幸福、可持续、公正、尊重公民权益、平等、可创造财富与保证健康的亚洲社会。

第三，该书的两大理论“亚洲伦理城市主义”和“后规划”都基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植根于人类解放与公正，提倡多元性和自下而上的规划过程。

传统的规划是自上而下（从理论到实践）的逻辑过程，但现实与理想往往出现很多矛盾。该书作者认为，传统的以欧洲为主导的城市现代化模式，自其出生以来就缺乏从现实得来的基础论据，所以，这种城市化模式在现实中往往难以得到贯彻。基于这种现象，作者认为规划可以是一个自下而上（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从而衍生出作者所主张的“后规划”思想——一种半无政府、适应性强、无秩序、开明的体系，同时是一个经济和利益推动的体系。根据每个城市不一样的发展历程，这种“后规划”思想可以使亚洲城市充分保护地方文化特色、建设多样性的亚洲社会。

本书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本书的核心。它首先通过与欧洲现代主义理念的比较，阐明了“亚洲伦理城市主义”的概念。其中，作者特别指出，由于亚洲与欧洲的文化背景不同（主要是亚洲受到佛家、儒家和伊斯兰文化的熏陶），应该拥有与欧洲不同的现代化进程；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不应该单单看重经济发展，而应该注重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市民的幸福程度（与社会保障和贫富差距相关）等；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促使穷国更穷、富国更富，而亚洲后发城市应该立足在地方文化的基础上，进行主动的全球化。

其次，作者阐述了“亚洲伦理城市主义”的一些重要元素。其中，作者认为，官方的城市纪念元素都是“胜利者”的“记忆”，而理想的城市应该有多元化的城市记忆（或者叫民间记忆）。公共性也应该获得适当的保护，其中包括集体的、文化的遗产等，并使得大众能方便从中获得利益。非确定性空间（公共空间，或向公众开放的空间）应该更好地为公众服务，以满足不同市民的文化、娱乐需求。土地政策同时被认为是城市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载体。因此，基于各种伦理价值观判断，土地政策作为强有力的利益分配和重新分配的工具，需要慎重考量。最后，作者提倡空间公正，因为金钱和权力是决定空间秩序的最核心因素，所以规划当中应该尽量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生存空间。

解释完这些核心概念以后，作者进而指出了实现“亚洲伦理城市主义”的途径——“后规划”。虽然这个“后规划”时代依然以经济为主导，但它同时拥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作者认为，基于不同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利益集团的多重复杂性，在实际的操作中需要用创造性思维来解决问题，特别是要提倡自下而上的过程，在实际操作当中确定多元价值观的判断与选择（如经济、生态、生活

质量、伦理、空间公共性等)，进而接受并提倡规划结果的多样化（包括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减少浪费、保护生态的可持续性等）。

第一部分的两个案例（香港中环和泰国曼谷）旨在为读者对前面的理论论述提供感性的城市认识。第二部分是作者近年来的论文集，充分体现了作者近几年对“亚洲伦理城市主义”这一议题的思考历程。其中包括了对亚洲建筑的评论、对越南河内、中国上海和新加坡的城市现代化历程的评价等。

该书不是教科书，也并非设计手册，而是城市规划、建筑从业人员的“清醒剂”和“新养分”。虽然该书缺乏严谨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与证据来支撑其论证过程，但它可以帮助我们反思现在的城市发展方向、方式和逻辑。虽然该书没有提出实际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实践者们还是可以在“伦理城市主义”的理论之上，结合当地的文化、经济、政治等条件，进行多元价值观的判断与选择。该书提醒我们，真实的生活世界大于系统，公正大于利益，解放大于控制。译者期望，该书能在读者的心中产生一定的思想碰撞，并能为读者思考城市化进程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评论

李士桥 (Li Shiqiao)

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学系副教授

在人类住区发展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城市扩张和聚集，尽管历史上某些城市也有过类似的痕迹，如宋朝的开封，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19 和 20 世纪工业化时期的城市等。我们的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改变。技术进步使“网络社会”成为可能；全球经济体重组成全球控制链，在边缘地区进行生产并在中心地区强化创新；人们的思想不断更新，以适应多元性的新状况。所有这些都是发生在人口急剧增长的亚洲中心区，特别以中国和印度最为显著。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城市发展太过忠实于机器城市 (the city of machine) 的理念；在将专家的机器城市的粗糙设想（通常是基于市场模式或对生物体的肤浅理解获得的）转变为现实时，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痛苦的节点。在此，多样性和差异性已经被缩减到十分可怜的程度。或许更糟糕的是，当人们试图改善这种令人遗憾的局面时，多样性和差异性已经被管理者们“重新定义”了——仅将多样性视为一个有意义的宣传符号，却掩盖了多样性缺失的真实情况。尽管近年来批判性的理论兴盛而起，许多城市也提出了新的发展设想，但有关城市建设途径的想法还停留在相对粗糙的层面。对于诸如伦敦、纽约、东京这些传统的城市中心，这个问题不大；而对处于急剧增长的亚洲城市中心来说，却因缺乏可靠的行动理论而延续着一个深层的危机，即草率地继续推行源于机器城市理念的城市设计和规划思想，而对诸如增长速度、技术和文化等一系列新条件欠缺充分的考虑。

林少伟的观点成为一个极为勇敢而关键的声音，他呼吁要在亚洲的建筑和城市主义背景下进行思考。他在近来的著作中提出了两个关键的概念，即“伦理城市主义”（ethical urbanism）和“后规划”（post-planning），从而引申出了一套“行动理论”。这两个概念都根源于对人类自由和公平的承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很多亚洲城市评论者不同，他有以下几方面特色。他是一个利害相关者，他在思考自己的家园。他是一个实际行动者，他在思考自己所做的事情。他同时具有独特的知识结构：他的知识和经历是世界性的，但他的研究视角是以亚洲为中心的。处于这样的立场，他能恰当地将事物放在历史和理论背景下加以思考，使亚洲城市主义研究远远超出简单的实证报告和危机管理。通过上海、新加坡、香港、河内和曼谷的案例分析，林提倡“伦理行动”。“后规划”的观点承认规划的实际性，同时也强调“去规划”的重要性。后者是指一个建立在地方信仰、文化和人文精神基础上的复杂的城市发展过程。基于当代众多学者的观点，林认为，公平就同一个基本法律概念一样，它是一种空间实践形式（共同的记忆、共同的空间使用和不确定性空间）。通过这些文章，林把建筑和城市主义的问题放在一个非常基本的层面，即为所有人界定和捍卫一个美好的生活。出于职业道德，他提醒我们要更加忠实于生命世界而非体制，更加强调公平而非利益，更加关注自由而非控制。

约翰·菲利普斯 (John Philips)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

论及城市伦理，就需要谈到某些极为必要但又受到偶发因素和历史事件干扰的条件。对此，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建筑师、规划师、政府和官员的决定和愿望。虽然这些决定和愿望常常是被指定的，但有时也带有主观随意性，而且有时是具有破坏性的。如果要在城市发展中推动某个伦理项目，即使它的相关条件能被建立，但通常也是困难重重。林少伟长期从事的亚洲城市主义的研究，正是为了实现该目标（理想的和现实的）而进行的执着探讨。

面对建构亚洲伦理城市主义的需求和渴望，及其所面临的巨大现实困难，林在本书中提出了两个大胆假设。首先，他认为他所讨论的伦理条件是可以实现的。这是一种理念而不是理想主义。即使现实的状况尚不明显清晰，甚至还处于无休止的争议和讨论之中，但大胆的假设是必要的。在这种意义上说，伦理城市主义的理念有其必然的先进性。立足于众多空间公平和城市发展的观点，林对伦理城市主义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尽管他从来没有充分而完整地阐述过这一理念的具体内容，他却实在地指出了行动的方向。第二个假设是，当前那些改变亚洲城市景观（空间、经济和文化等）的历史和体制因素，必定成为未来发展的基础。这些现实条件不会催生任何简单的现实主义，而对于亚洲城市主义的未来，从伦理的角度出发，必须对其可能性进行开放性的探讨。

有关伦理观念的讨论由来已久。林采用了“激进的后现代视角”来推进这一理念。在此，伦理这个老称谓应该被视为某种蕴藏的但有待进一步确定的力量和意义，并对实验性的社会生活文化的杂乱和不尽合理的滋生环境保持开放的态度。林的伦理概念是大家极熟悉的，它包括幸福、可持续性、公平、平等、富足和健康等。在他眼里，这些概念具有新的含义，并在全球化的背景条件下发生演变。而这些背景条件要比林提出的综合伦理概念更加难以预知。

在他对这些条件的分析过程中，同时也确定和重申了某些历史事实。首先，资本主义以全球化的形式（不亚于它的任何其他形式），引起了它所触及的经济体的难以预料的变化。无处不在的贪婪和贫困证明了利益原则是资本主义盛衰的

驱动力，而该原则是不会轻易被动摇的。但林坚信，对地方性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进行伦理管理应该是可能的。

其次，某些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性教条即将消亡，尤其在亚洲建筑和城市规划中，新的实践证明欧洲现代化的一些传统理论已经难以适用，如系统论等。林的许多案例，如河内、曼谷、上海、香港、加尔各答（请注意不是新加坡）等，揭示了一种动态的城市主义。这种城市主义并不能被简单的条件或数据所代表，如城市增长、人口数量、经济不公平的状况等。相反，这些案例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参照物来指导未来的实践，如“后规划”的原则、不确定性空间的优点、公共的有效性等。

鉴于面临的巨大困难，毫无疑问，林的设想是令人钦佩的，因为这些设想不同于自负的乐观主义。在城市规划中推进伦理主义是受到多方支持的，例如对民主的全球倡议以反对不公平和经济剥削等。但这些倡议不可能改变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的全球化行为将在可见的未来继续深入。但正如林在书中所说的，当前许多亚洲城市有其特殊的条件，这些条件给它们的市民提供了一个更加平等、更加积极、更加具有创新性的未来的希望。我们希望，那些对自身世界的发展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能够研究林的书，消化或运用他的观点。

沙朗 · 西蒂奎 (Sharon Siddique)

Sreekumar. Siddique and Co

亚洲城市实验室奠基人之一 (Co-Founder, Asian Urban Lab)

建筑师理解城市空间的视角与社会学家极为不同。二者通常采取平行的视角来看待城市发展。他们之间很少相互讨论，更少会有一个建筑师将自己沉浸在社会科学文献里；更为罕见的是，一个建筑师会采用社会科学理论来强化对建筑设计原则的解释。这本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告诉我们，如果这二者能成功地融合，将会产生有趣的形式。

通过采用一种后现代的框架，林少伟建议运用后规划的方法来理解当前亚洲城市的演化过程。而且他更进一步，认为这种后规划进程其实可以帮助建立他所定义的“亚洲伦理城市主义”。这就需要对城市空间进行全面创新性的描述。这当然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后现代主义要求，这样的理论必须是多层面的、自下而上的，而且是革命性的。正如大卫·吉森 (David Gissen) 指出的：“城市内，空间无处不在，自然、生物和生长无处不在，存在问题和争议的地区无处不在。”¹

这本书是有关后现代主义的集萃。林少伟用各种各样的概念来阐述他的观点。想要对他本书中的观点给出总体的评价是很困难的。有一个方法可以理解他的观点，就是关注他用于解释观点的有趣的案例研究。我发现新加坡的章节尤其有趣。因为对新加坡的城市状况进行创新性的描述是很有挑战性的，在这里，现代主义思想和现代主义的规划范例表现得几乎无可挑剔。

在新加坡的章节中，林少伟使用的最有趣的后现代概念之一是“白板” (tabula rasa)。关系到其他现代城市的状况，此概念具有现实的及潜在的概括力。白板暗示着，对新加坡的主流认知在某些方面偏离现实，“城市浮夸的形象”的描述只能代表很少的方面。当然，白板仅能停留在概念层面。因为有四百万人生活和工作在新加坡的城市空间里，这个城市当然不是一个真正的白板。但提出这样的假设也是必要的，目的是在概念上取得超越。这就是林少伟在此提出的，一个非传统的、少数的、隐晦的但却同样令人信服的描述。假如现代主义所驱动的城市规

划和建筑是我们对城市的主流认知，那么什么是少数的、非传统的认知？如何进行清楚的阐述？林的答案就是亚洲伦理城市主义。

针对我们熟悉的新加坡这一具体案例，追溯其发展轨迹是十分有用的。林少伟从时间维度进行阐述。起始点是殖民时期和它的建筑。殖民时期的建筑遗产具有相互对立的身份，尤其是在独立初期。考虑到后殖民时期初（1959 ~ 1975）新生“民族建筑”的形成，年轻的新加坡建筑师们受命设计颇为单纯的新加坡建筑。预期是使新加坡建筑逐步发展，建筑师们与政治家、官员和客户进行创造性的对话，以产生一个后殖民时期的新加坡城市景观。但正如林少伟明确指出的，这并没有发生。为什么？

1975 年，越南战争的结束标志着社会主义和东南亚资本主义的（暂时）分裂。而新加坡明显地将其未来指向以美国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意味着其将越来越依赖于吸引跨国公司，并将其经济融入全球市场。新加坡成为一个全球（资本主义）城市。它渴望成为一个国际化现代大都市。但新加坡当局突然发现，已经没有空间来满足其有机发展，也对新加坡本土建筑的逐步演进失去信心。国际建筑师随即被招来创造新加坡政客们渴望且可即刻而生的现代典型的全球化城市。

1975 ~ 1995 年是新加坡城市天际线向现代化转型的时期。但这种转型不是有机的。很少有新加坡建筑师能参与进来，他们只能在主流的现代主义建筑市场（如居住、零售还有公共建筑）的狭缝间生存。当地的建筑师（和艺术家）被边缘化，基本上没有任何话语权。因此，这段时期表现出一种平行轨迹的状态——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平行。

林少伟指出，这些少数派（当地建筑师）的声音可以在三个领域听到：“保护和适应性的再利用”、“区域主义和热带地域性”，以及“向外拓展”。这是与新加坡之外的行动保持联系的。虽然在新加坡，他们的海外同行比他们更受认同。但他们当中有些人承担着新加坡以外的设计任务。在艺术界和建筑界存在一个共生的关系。在面对一个坚挺的主流视角时，他们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备受认同的少数派。

1995 年标志着美国衰退期的开始，这最终导致了 1997/1998 年的亚洲经济衰退。这是林少伟所划分的最后一个时期，即从 1995 年至今。这段时间里，新加

坡遭受了沉重打击。同时还有一个新的因素值得考虑，那就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已经加入到发展的行列中来。至此，那些具有主流认知的人们开始发起“重新评价”（remarking）行动，但至今仍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模式来替代 20 年来以资本出口导向、跨国公司主导为核心的模式。但不可否认，这种模式是新加坡繁荣时期经济呈两位数增长的基础。

矛盾的是，增长引擎的减速却带来了艺术界的强大，尤其在电影院和剧院的设计和建造方面。展现少数派认知的非传统性范例已经成为年轻艺术家们的主要论题。相似地，在建筑界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创新。这到底发生在哪里？在此，林少伟借用“非确定性空间”的概念来解释城市的某些地区。这些地区既不是相对而言未被白板运动所触及的芽笼（Geylang，新加坡的红灯区），也不是自发形成的荷兰村（Holland Village，新加坡的“波希米亚飞地”）。它是通过此类空间的有机增长，有能力再造的一个创新性的、有机的、可使新加坡建筑复苏的空间。大约 30 年后，年轻一代的建筑师开始再次质疑所谓的主流认知。但不同于鼎盛时期（heyday），主流意识形态处于守势。一个令人信服的新的现代主义范例可能向他们偏爱的尺度倾斜，但我们还没有看到它的出现。另一方面，创新的、后现代的认知正在缓慢获得动力，它的轮廓逐渐变得清晰。最后关于亚洲伦理城市主义的论述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它的建构。

注释

- 1 David Gissen, “Park/ No Park” in Cabinet Magazine (2002) .

前言

几十年来，对亚洲城市主义及其自身条件快速变化的关注，使我逐渐意识到亚洲城市强大的地方特性和混乱不合理的空间表现，以及现代主义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冲突。过去几年，我在大量的文献和报告中批判性地分析和讨论了这些问题。自1990年代早期以来，我清楚地意识到一件事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是传播我的理论知识，以及理解当代多个学科所讨论的逐渐增加的复杂性。目的是积极参与当前对亚洲城市主义的论述，并作出有效的贡献。

理论家们大量的文化研究著述强化了我的看法，即对亚洲（后）现代性和城市主义的动力机制的分析，必须在联结多种原则的某种框架下进行，也必须牢牢立足于地方的结构背景和后现代多元的当代特性。在此过程中，我确定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关键问题。首先，随着现代主义规划的即将终结，失败的现代主义景观的印迹和残骸如垃圾般随处可见。其次，亚洲繁荣经济中上百万的城市穷人，受苦于城市特性丧失和再发展的冲击，有权获得平等分享发展成果的权利。再次，当前可操作的激进的城市理论留于空白，而同时处于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城市正在发生着史无前例的扩张和重构。

正是在这种极富挑战的背景下，我试图提出亚洲伦理城市主义（Asian ethical urbanism）这一激进理论的概念框架，它超越和摈弃了现代主义规划的种种限制和刚性，在当前亚洲城市史无前例的爆炸性增长状况下确定它的主要内容。尤其关注的是当前亚洲城市和建筑状况的特性和动力本质，目的是质疑和减轻当前新自由全球资本主义产生的社会生态形式和政治影响。与许多非建筑师的主要城市理论家不同，我在概念上的起始点不可避免地是空间的、三维的和城市导向的。不可能有其他选择。

本书的第一大部分包括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首先，“目标”（orientation）部分通过阐明那些先前无疑受到西方价值观和言论约束的观点，确定了三个命

题——多元现代性、伦理和幸福及激进的全球本土性——作为亚洲伦理城市主义有效的结构基准。其次是“亚洲伦理城市主义”部分。该部分确认、分析和界定各种伦理要素的本质，并讨论其与快速扩张的亚洲城市的整合。按照这种探究性的综合路径，我确定了五个主题：保护和记忆、保护公共性、非确定性空间、土地以及空间公平。许多其他论点，如基本权利、生态可持续性、住房与临时住处、交通与流动性，以及那些仅仅关系到具体地方性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分析。最后一部分，检查后规划的后现代现象，一个准无政府主义的、灵活的、无序的、开明的系统，能够成为实现亚洲伦理城市主义的有效手段。

本书的第二大部分包括对河内、上海和新加坡三个案例城市的研究。这是在过去两年内完成的，试图将我的理论框架同亚洲城市的现实状况相匹配。河内的案例研究是紧急呼吁对老城区的环境和社会文化完整性的保护。对上海的初步观察，是试图探讨近年来城市急剧变化过程中的痛苦和激动的经历。新的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尽管毫无保留地与全球接轨，却深深地渗透出独特的中国特性。雷恩·梵·斯凯克教授指出，新加坡的案例研究“逐渐舍弃这些作者的东方主义而非其观察过程，他们主要受到西方影响，痴迷于亚洲城市的舶来品，并将其像动物园参观式地展示给他们的同胞。”这一部分还包括“新千年的亚洲建筑”，是以一个后现代的视角对西方主导的当代建筑理论与研究进行激进的审查，并尝试以它们自己的语言来评论当代亚洲建筑。

致谢

我的主要论题，“亚洲伦理城市主义”，在其内容和结构安排方面需要一个包容且创新的方法。我要特别感谢沙朗·西蒂奎和许婉婧对这一挑战性任务作出的极其珍贵的评论和贡献。

我必须向雷恩·梵·斯凯克表示深深的谢意，他给出了启发性的、有见地的引言。尽管十分繁忙，李士桥、约翰·菲利普斯和沙朗·西蒂奎仍然煞费苦心给出了极富洞察力的书面评论，给读者提供了对本书的较为深入的理解和解释。此外，林瑞光负责本书的设计和排版，我也必须向他表达我的谢意。感谢许多建筑师同意将他们的作品作为本书的案例。同样需要感谢我的秘书 Patricia Lee，承担许多有关本书出版的事务。特别感谢林瑞光和许婉婧，他们分别对曼谷和香港的案例提出了有趣的见解。十分感谢亚洲城市实验室，允许在本书中再版《建筑艺术特性：新加坡白板之后还有生活吗？》和《你被上海化了吗？全球本土化的上海文化和特性》。

最后，我要对邵氏基金会的邵维铭（Shaw Vee-Meng）表达最深切的谢意，是他对这一主要论题——亚洲伦理城市主义的研究提供慷慨的资助。还要感谢世界科学出版公司的潘国驹（K K Phua）教授、K K Phua 夫人和 Cheong Chean Chian，他们为本书的出版投入相当大的精力。